



项英给工农通讯员的两封“廉政回信”

一封检举信引起项英高度重视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防止和杜绝贪污腐败、官僚主义滋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便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作为代表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有权报告法院,提起公诉。为了同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通过设立控告局、建立突击队、设置巡视员、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等方式,吸收最广大工农群众来参加检察活动,揭露和打击各种贪污腐化现象。工农通讯员便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村落中委任的不脱产人

员。这些通讯员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违法失职、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即可以通信方式向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报告,使广大工农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能及时上达,发挥工农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1933年初,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收到通讯员李克均的一封检举信,信中报告了苏区干部数人犯错误的情况。检举信立即引起项英的高度重视,于2月8日复信李克均,要求他把数人的错误事实进行详细报告。不久,项英收到李克均写的详细检举信,并于2月19日再次复信李克均,对其检举内容进行批示:“李克均同志,来信收到。关于许文亮的事你们可以召集工作人员来清查他的账目,或者组织一清查委员会来清查他的贪污关系,如果查有贪污行为,向他来作斗争。此致,赤礼!”

查清贪污腐化事实

李克均出身贫农,兴国县人,1931年入党并进入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后被委任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通讯员。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与乡苏维埃基层工作人员就反腐工作多次书信交流、对话,生动展现了中央苏区严正清朗的执政氛围。

经多方调查,终于查清了许文亮贪污腐化的犯罪事实,比如:作为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利用中央政府派他到石城工作之机,他竟把打土豪来的金表一只、鞋一双、自来水笔一支,不归公家;又把打土豪来的布,不经财政部长的许可,

自行做衣服给他老婆;以财政部名义私自扣留粉干,破坏苏维埃不准做粉干的法令;等等。

4月29日下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根据许文亮等人的错误行为,举行检举运动,对许文亮等人进行公审,发动群众揭发其贪污腐化、官僚主义错误行为,并决定开除许文亮处长职务。5月2日,《红色中华》报以《两个“宝贝”的公审》一文,对许文亮等人的公审情况进行了报道,并号召苏区群众“我们要以这一例子,来警醒全苏区的工农群众,随时揭发各级政府及革命机关内的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官僚主义者,给以无产阶级的铁锤痛击,叫他们一个个滚出苏维埃去!”

换来“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开展的反腐倡廉运动,有力打击了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支援了革命战争,锤炼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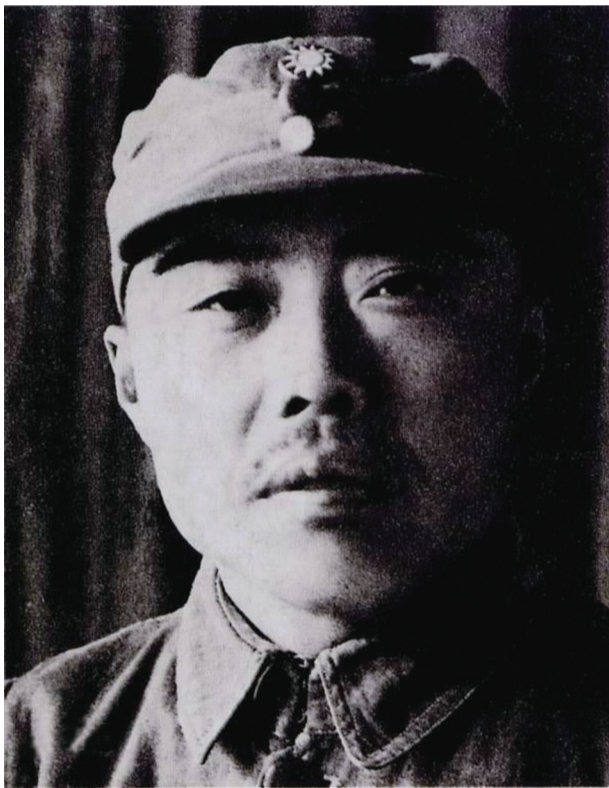
群众的监督和检举,为揭露、打击各种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在《红色中华》报公布了许多在中央机关和企业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情况。此外,在群众的检举监督下,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

员部同有关部门先后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李克均一样的工农通讯员的监督和检举,以项英为代表的铁面无私地秉公执法,才使得中央苏区内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都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藏身之地,才有了“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的赞誉。
据《学习时报》

钟军 苏春生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着两封中央苏区时期的特殊回信。两封信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分别于1934年2月8日和2月19日写给通讯员李克均的复信,为国家一级文物。信件内容言简意赅,寥寥几十字,却令人肃然起敬,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先辈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铁血担当、坚定意志和如磐决心,成为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运动的生动缩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正风肃纪反腐的历史见证。



项英

被誉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

郭好礼,原名郭富堂,1904年8月13日生于河北省临漳县郭小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富堂举起抗日义旗,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秋,郭好礼率部转移到鲁西北地区,和八路军东进纵队协同作战。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郭部不断壮大,发展为4个团6000余人,并夺回了东阿县城。此后,郭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他们通过阴谋诡计,将郭好礼的部队强行遣散。

郭好礼回到临漳县,召集旧部,改编地方民团,组织武装,仍以五支队番号进行抗日活动。有亲戚劝他说:“你在山东混到几千人马都没成功,现在只有这百十多人,还闹腾个啥?”郭好礼笑着问对方:“咱们庄稼人遭了大水,好好的庄稼没收成,还种不种了?”对方说:“咋不种呢!不种庄稼指望啥过日子?”郭好礼说:“这就对了,我也是失败了再干才有指望,不打走日本鬼子,我们还指望啥过日子哩?”1939年6月,中共冀鲁豫特委派人到郭部,组建了党支部。不久,郭好礼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同年年底,五支队改编为八路军三十三支队,郭好礼任支队长。

1940年春,三十三支队编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四团,郭好礼任副团长。8月,他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后调任八路军冀南军区轮训队副队长,并组建抗日武装“临安支队”。

郭好礼常在战斗间隙教育战士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群众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带领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当部队夜行军进村时,郭好礼为了不惊扰群众,就和战士们睡在路旁、草垛旁。天明后,郭好礼率领战士们给群众担水、扫院,用实际行动与群众建立起“鱼水深情”。

1941年9月,郭好礼调任八路军冀南一分区参谋长。第二年,冀南军区组建路南支队,郭好礼任司令员。他率部活动于晋冀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3年1月,路南支队接连拔除日伪张仁堂、何家庄等5个据点,又一举攻克魏县县城,歼灭了大批日伪军,极大地增强了魏县人民的抗日信心,也引起敌人的恐慌。2月中旬,日伪调集大批部队,向魏县以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2月27日晨,敌人趁着晨雾掩护,将路南支队围困在不足百户人家的屯礼村。激战中,郭好礼带一部分人冲出了村子,但支队的大部分指战员仍被封锁在村里。他急令警卫员回村,带领指战员朝村东突围,自己留下牵制敌人。为掩护警卫员,郭好礼主动向敌人射击,将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他沉着应战,击毙了数名敌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在一处荒地,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9岁。

郭好礼牺牲后,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给郭好礼父亲郭振湖发去唁电,电文中称“好礼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艰苦卓绝英勇牺牲之精神,足为三军楷模”。4月1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悼念文章,称郭好礼“忠诚爱国堪称楷模”。梁银安 据《人民政协报》